

北京市文旅局局长宋宇履新首旅集团董事长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旗舰企业,首旅集团迎来了首次“换帅”。1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首旅集团官网挂出的董事长致辞,已经由段强变为宋宇。据首旅集团内部人士透露,在近日集团召开的内部大会上,已经宣布了一项重要任命,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卸任,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宇接任。在过去的21年,首旅集团经历了高速发展,如今新帅上任,这艘旅游航母将如何前行,也成为业界关注的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段强从1993年到1995年任北京市副市长,此后于1998年负责组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旅集团),并出任首旅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段强任职期内,首旅集团规模不断壮大,并完成了多项收购。据首旅集团官网显示,目前该集团旗下拥有首旅酒店、王府井、首商股份、全聚德4家上市公司,集团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段强在任的21年期间,首旅集团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资产重组,最终形成了产业链完备的旅游集

团。1999年,原国家旅游局及国家各部委与其所属企业脱离行政隶属关系,部分在北京的旅游类企业并入首旅集团;2004年,该集团实现了与北京新燕莎集团、全聚德集团、古玩城集团和东来顺集团的资产重组和业务整合;2010年,北京农业集团、西单友谊集团先后并入首旅集团,至此,通过数次重组,首旅集团构建起了涵盖“食宿行游购娱”全旅游产业链的六大专业板块,经营业态也涵盖了酒店、餐饮、旅行交通、旅行社、商业、景区等业务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首旅集团还对旗下二级企业进行混改,并完成了多项收购。其中在2014年11月收购了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2015年,首旅集团旗下子公司首旅酒店又对如家进行了私有化,并成为国内最大酒店集团锦江之后的第二大酒店集团。此外,首旅集团还通过首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对北京环球影城进行布局,预计至2021年北京环球影城开业之后,该项目每年将吸引超过1000万的游客。

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卸任后段强仍将担任世界旅游联盟主席和中国旅游协会

会长职务。

对于宋宇的接任,业界也投来期望的目光。资料显示,宋宇曾任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1年7月,开始担任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此后又历任党组书记、主任,并于2018年11月担任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虽然一直深耕旅游行业,不过摆在宋宇面前的任务并不轻。据悉,早在2017年4月,首旅集团就被北京市委深改组确立为首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首旅集团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此前,首旅集团曾指出,未来的投资和资本运作领域将聚焦于生活方式服务业,而操纵这个千亿级的旅游企业并迅速显现出效果,显然并非易事。同时,首旅集团内部也正在思考如何将旗下商业领域和旅游资源进一步融合。有消息指出,宋宇上任后的第一站,便是赴旗下王府井集团进行调研。

除了在商业上发力,刚刚移步大兴新机场的首都航空也被业界寄予厚望,未来如何在航空领域突围,也成为摆在首旅集团新掌门人面前的任务。

工资帽能不能拯救中国足球

从10月中旬对垒菲律宾前夕的踌躇满志,到自摆乌龙败于叙利亚后的银狐二度告别,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国足球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大变动。推倒重建,改革呼声再起。11月20日中午,中国足协官方微博发布公告,要求中超、中甲、中乙各级俱乐部暂缓与国内球员签署个人工作合同。当日晚6点11分,人民日报体育微博发布消息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球员限薪将有重大动作:中超俱乐部依然不能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中甲和中乙联赛下赛季的顶薪分别是500万元和300万元。工资帽指向了球员的高薪低能,试图把中国足球拉出商业化时代的金元泥沼无可厚非,“我觉得帮助还是会有,但是多大很难说。因为核心问题是职业联赛就是一个经济形态,是一个商业模式,你没有好球员、好球员少,价格就贵,转会费就降不下来,工资也就降不下来”。足球评论员杨天婴坦言。

■ 暂缓签订合同

中国足球刚刚经历了黑色的一周——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中客场1比2不敌叙利亚队、国奥队在热身赛中1比5惨败给澳大利亚队、国青队25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这个节骨眼上,任何关于足球的风吹草动都被公众盯着。11月20日,中国足协发布关于《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的说明提出,中国足协前期做了广泛调研,听取了部分职业俱乐部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正在拟订“关于进一步推进联赛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将会对足协现有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作补充、完善和调整。该意见计划于12月初公布。

上述说明表示,意见制订的原则是推动各级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降低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负担,规范薪酬体系、转会市场,严格监管措施,推进职业俱乐部青训工

作并保护俱乐部青训利益。在新的政策调整正式公布之前,暂缓各职业俱乐部与球员签署新的工作合同。

尽管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出台,但限薪制度似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再加上央媒随后披露出来的细节,工资帽几乎成为定局。

“其实年初足协就出了一个‘四大帽’,本身就是限制俱乐部过热投入的。我认为陆陆续续还会再出台很多配套的东西,但限薪本身还是挺虚的,主要是供求关系不变,薪是很难限住的。”杨天婴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在业内看来,足协出台这一规定与之前国足输球存在一定关联。不过,杨天婴认为,除此之外,限薪应该是在一个长期的计划之内的,不是临时的想法,即便没有输球,限薪也会出台。

■ “四大帽”延续

“限薪令”似乎已经蓄势待发,但事实上,足协在薪酬方面早就动作频频。在去年12月20日的足球职业联赛总结会上,足协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对俱乐部投资人投资、球员薪酬、单场奖金、球员转会等方面划定天花板,也就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四大帽”政策。

“四大帽”中最受关注仍然是“薪酬帽”。据中国足协准入审查部部长何玺介绍,中超球员薪酬支出占俱乐部总支出比例限额将逐年下降,2019-2021年分别为65%、60%和55%。中超国内球员个人薪酬(不含奖金)最高不得超过税前1000万元人民币。参加2019年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酬限额基础上上浮20%执行。

薪酬之外,奖金也被大幅削弱。根据当时的规定,2019赛季,各俱乐部同时大幅降低奖金,单场奖金限额由各俱乐部共同议定,赛季初须对奖励标准进行公示,禁止以其他名目发放比赛奖金,严禁现金发放。

■ 金元足球VS市场化改革

自广州恒大开启中国足球的商业化金元时代以来,资本的注入确实让中超增色不少,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中屡屡斩获,不过,国字号球队的战绩却又屡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告诉国人这种进步是脱节的。高薪低能,是目前中国大多数球员的现实情况。从2019赛季各俱乐部支出与球员薪酬情况分析,至少亚冠区4支球队的运营成本均超过“限薪”标准,国脚实际年收入多在1500万-2000万元区间。

但是工资帽政策的出台,能够让中国足球回归有规律、有序的发展吗?

据了解,就在通知下达之后,也有不少俱乐部产生疑惑。上个月刚刚宣布下赛季成立职业联盟,由参与者自己管理联赛的概念其实也得到了各俱乐部投资人和球迷、市场的认可,然而今天下达的限薪令却打了职业联盟一个措手不及。

根据10月召开的最新一次足协新闻发布会,完全自治,掌握管理权、经营权、权益

与此同时,另外的“注资帽”、“转会帽”等也饱含着足协给市场降温的态度。“投入帽”方面,2019年中超球队支出的封顶限额为12亿元,而在2020年和2021年,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标准将降低为11亿元和9亿元。

在公布“四大帽”具体细则的同时,足协还出台了惩罚举措,对于支出总额、薪酬总额、注资总额超标的球队,按照超标比例,会限制各队引进内援和外援的人数。足球业内人士透露,此举是针对职业俱乐部存在的盲目投资、“天价转会费”和部分球员过高薪酬、签署“阴阳合同”、逃缴税款及欠薪等情况。

“中国足协此前调研了37家俱乐部,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渴望一个公正的竞赛环境。其实投入也是公平竞赛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搞联赛不是比着烧钱,”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李毓曾曾说:“一个俱乐部投入20个亿,另一个投入3个亿,这个游戏怎么玩?”

分配权,这是中超职业联盟的最大特点,相较于以往由中国足协管理的中超公司而言,这也是最大的不同。

然而,不少俱乐部11月20日当天才知道这条通知和调整,按照职业联盟成立时的说法,任何大的政策调整都会至少一年提前知会各俱乐部。这一次不仅没有提前知会,甚至连参与决定和商议的机会都没有,令投资人都产生了疑惑:职业联赛究竟由谁来管理?

按照之前的说法,足协只在重大决定上具有一票否决权,外界甚至还质疑一票否决权是否还是足协一家独大。但其实职业联盟和足协是有关于一票否决的白名单的,其中涉及的是扩军等重大决定。限薪政策虽然足协也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但在下达通知之前都没有和职业联盟进行商议,的确令人对职业联盟存在的意义产生疑惑。而且受到直接影响的不仅是球员,职业联盟的投资人同样是直接受影响的单位。

北京商报记者 肖涌刚 汤艺甜

“重置”红线 游戏厅行业大洗牌将至

今后,游戏厅在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时将被戴上“紧箍咒”。11月20日,文旅部正式印发《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办法》,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游戏厅等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设备。在业内看来,《办法》将在国内的游戏厅市场掀起一波监管风暴,尤其是涉及奖励性质、具有博彩色彩的设施设备将被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入市,不少经营者将面临设施、人员配置等大调整的局面。不过,目前《办法》只是设立了粗线条的管理框架,仍有不少政策“留白”,因此未来相关部门可能还会针对市场上不同类型的相关娱乐场所和设施进一步出台细化管理方案。

游戏厅中不得设捕鱼机

根据《办法》,本次纳入管理的游戏游艺设备,主要分为电子游戏设备(机)和游艺娱乐设备两大类。据知情人士介绍,前者主要指的是游戏中常见的电子游戏机类的设施设备,而后者则涵盖抓娃娃机等更侧重娱乐性质的产品。

《办法》提出,今后,我国游戏游艺设备将不得含有宣扬赌博的内容。具体来说,新政实施后,游戏厅中的设施不能触碰的内容“红线”包括:具有或者变相具有押分、退分、退币、退钢珠等功能的;捕鱼机等以设置倍率形式以小博大的;老虎机、转盘机、跑马机等由系统自动决定游戏结果的;以及含有其他宣扬赌博内容的。

而且,为保障对游戏厅等场所对内部提供游戏机等设施内容的把控,《办法》明确,娱乐场所以及其他经营场所不得利用未经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内容审核、擅自实质性变更内容的游戏游艺设备从事经营活动。此外,《办法》甚至还进一步提出,就连利用游戏机等设备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游戏厅等经营场所,也应当报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奖品目录等相关信息。

新政的出台,引发了国内的游戏厅等经营者以及制造、销售厂商等不小的震动。有专家直言,《办法》将有助于捋顺国内游戏游艺经营市场秩序,更强力地把控游戏厅等场所的设备内向未成年人输出的内容,但同时,不仅市场层面端将迎来大洗牌,监管端也需要面临多重挑战。



经营场所面临大改造

“现在,整个行业内带有博彩或类博彩奖励性质的设施设备还是不少的,以前对于未成年人的游玩时间、范围确实没有严格限制,而这类消费者也是游戏厅等场所的主要受众之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

就此,北京商报记者也前往金源新燕莎MALL乐酷电玩俱乐部等相关场所进行了实地探访。记者发现,目前不少电玩城、游戏厅类的场所中,仍然设有不少退币、以小博大类的游戏机。以乐酷电玩俱乐部为例,记者初步统计,场内共有游戏机类设施不下百部,其中有约10台都具有直接返游戏币的功能。此外,《办法》中明令禁止的捕鱼机,也摆放在了该游戏厅中相对醒目的位置,等待着前来游玩的消费者们。

虽然在采访时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来上述游戏厅中游玩的消费者较少,但其中未成年人单独或与家长前来的并不在少数。

“可见,新政实施后,游戏厅等场所的经营者有相当一部分都要面临更换设备、设施,甚至重新调整定位的局面。”王兴斌也提出,其实游戏机的奖励和赌博性质如何界定,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在业界,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比较模糊。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也表示,娱乐场所中完全禁止所有带有奖励色彩的游戏机,确实不太现实,毕竟成年人对于这类娱乐设施还是有需求的,关键还是如何管控未成年人不受赌博内容的诱导。

亟待分级细化

包括王兴斌、陈少峰在内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办法》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规定,针对纷繁复杂的游戏厅、游戏机市场来说,势必不能“一刀切”地管控。上述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办法》的出台,主要是为了与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相关规定形成配套,但具体什么样的场所和设备可以有条件地开放,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娱乐场所设置的游戏机等设施主要就是面对未成年人或低龄儿童的,非国家法定节假日是他们消费的重点时段,如果完全不分类地禁止,确实对市场会形成不小的影响”。

陈少峰进一步提出,游戏厅以及其中的游艺厅可以引入分级制度,哪些类型的场所和设施可以在哪些时间段开放给什么样的人,确实需要通过管理细则进一步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中将近年来大热的VR娱乐、抓娃娃机等设施也纳入了监管的范畴,《办法》规定,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制定适应儿童游艺娱乐场所、虚拟现实游艺娱乐场所、专营抓娃娃机等礼品类游艺娱乐场所发展的使用面积。对此,王兴斌也表示,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地铁、商场甚至街边空地都有集中摆放、设置的盲盒机、抓娃娃机、VR游戏机等设施设备,而且很多都采取了“无人看管扫码游玩”的方式经营,如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设施和场所进行监管,相关制度如何设计,也是一项难度不小的挑战。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